

#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 與歷史對話

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

柯文 (Paul A. Cohen) / 著

董鐵柱 / 譯

中華書局

□ 印 務：劉漢舉  
□ 排 版：高向明  
□ 封面設計：霍明志  
□ 責任編輯：黎耀強

## 與歷史對話：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

□

著者

柯文 (Paul A. Cohen)

□

譯者

董鐵柱

□

出版

中華書局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2338 傳真：(852) 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h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2100 傳真：(852) 2407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21 年 3 月初版  
© 2021 中華書局 (香港) 有限公司

□

規格

16 開 (230mm × 170mm)

□

ISBN：978-988-8675-93-7

## 目 錄

序	iii
前言	ix
致謝	xv
<b>第一章 古時之勾踐傳說</b>	001
上古時期的勾踐傳說	005
勾踐故事的主要主題	031
<b>第二章 國恥之重：晚清與民國時期</b>	039
晚清：問題的出現	041
民國時期：牢記國恥	048
文化共識：民國時期勾踐故事的傳播	057
勾踐故事在媒體和其他地方的迴響	067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蔣介石和作為榜樣的勾踐	080
抗日戰爭和中國的雪恥	090
<b>第三章 蔣介石在台灣的困境</b>	103
1950 年後台灣的環境	105
改編和流行：話劇和戲劇	109
作為教材的勾踐故事：黃大受的努力普及	127
給兒童的勾踐故事：連環漫畫和其他繪本	140
相關性的減弱：1980 年後台灣的勾踐故事	149
<b>第四章 危機與回應：1960 年代初的「臥薪嚐膽」熱</b>	159
關於勾踐故事的戲劇的井噴 (1960 年—1961 年)	163

## 序

茅盾對「臥薪嚐膽」戲劇的評價	172
曹禺的《膽劍篇》	183
<b>第五章 1980 年代的政治寓言：蕭軍和白樺</b>	207
蕭軍（1907 年—1988 年）	210
白樺（1930 年—2019 年）	221
<b>第六章 勾踐故事在「私有化」的中國</b>	237
愛國主義教育	240
教導共產黨員的行為	244
個人和集體動力：成功的關鍵	248
為「小皇帝」和「小女皇」們的現實生活做準備	254
在二十一世紀之交推廣勾踐故事	257
<b>結語 跨文化的視野</b>	269
<b>參考書目</b>	289
<b>譯者後記</b>	315

西方文化有着它們的英雄——摩西(Moses)、亞瑟王(King Arthur)、聖女貞德(Joan of Arc)、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能與越王勾踐相提並論。他的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而且也為很多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所知曉。但是，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西方學者幾乎對這一古代帝王的傳說一無所知。直到開始研究中國民眾對國難和國恥的回應，柯文才知道了它的重要性。最初他發現在帝國晚期和民國早期的文學作品中都提到了勾踐，這些信息為他提供了靈感。但是，他馬上就發現在所閱讀的材料中，勾踐故事可謂無處不在：在戲劇中、在教材中，以及每一種形式的大眾傳媒中。一個生活在兩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物應該被銘記，這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不過勾踐被樹立為現代集體和個人行為的榜樣，這才是真的令人震驚的，至少對西方文化背景的人來說是如此——他們和他們所尊敬的人物是保持着距離的。正如柯文的著作作用眾多細節所展現的那樣，這位國王在遭遇了奇恥大辱後，重新振興了他的王國，並且打敗了他的敵人。這對於現代中國的精神生活來說是一個極其強烈——而可能有時無形的存在。

這位古代君王的傳說複雜而充滿了模糊不清之處，但其中心是越王勾踐這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在被鄰國吳國強有力的統治者徹底打敗之後，度過了難關，通過實踐「臥薪嚐膽」而最後一雪前恥獲得了勝利。這是一種延伸了的儀式感，表達了自我否定和自我重生，它使越國重獲擊敗對手所必須的力量，並隨後在從晚清以來現代中國每一次遭遇失敗和恥辱時成

為了集體的訴求。在一百多年裏，它不但為朝廷的需要服務，而且也為愛國主義者的復興服務。政治左派和右派都使用它，為個人和公共的目標提供了一個顯然取之不盡的資源。越王勾踐從失敗和恥辱中站起來，這證明和古帝國的保衛者們有關，也和他們在民國時期的對手有關。在抗日鬥爭中，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它都佔據了中心的地位。當蔣介石撤退到台灣時，這個故事跟隨着他，並輕而易舉地被轉化到了台灣和大陸的鬥爭之中。即使在 1975 年蔣介石逝世後，「臥薪嚐膽」也保持着強有力的影響。但是，它也支持了毛澤東使中國大陸富強並打擊冷戰對手的努力。

但是當台灣和中國大陸擱置了它們的直接敵對，並將它們的精力重新用於經濟發展後，「臥薪嚐膽」並沒有結束。今天，「臥薪嚐膽」不再用於備戰，但在備考和商業競爭中依然有意義。它從公共事務領域轉移到了私人領域，成為了用競爭性的個人主義這一資本主義原則來振興海峽兩岸的部分推動力。勾踐故事一直是通俗文化——特別是戲劇的一部分，它也表現在漫畫、電影、電視和最近的旅遊業中，使得那些知道這個故事的人去參觀越國的古都紹興。毫無疑問，這本書會引起外國旅行者的興趣，因為正如柯文所說，勾踐故事值得被西方人了解。這並不是因為其敘述上的優點，而是因為它在當時歷史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這些實踐不僅僅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還影響了整個世界。

柯文這本書的價值在於他願意扔掉有色眼鏡，從十九世紀下半葉歷史學家的學術規範建立伊始，他們就願意戴這種有色眼鏡。從那時起，像越王勾踐這一類故事就被留給了文學專家或是民俗學家。自從歷史和文學分家，歷史學家們就將小說視為有趣而不重要的。各個大學監管這些學科的界限，使得學者很難將各個學科聯繫起來，而這種聯繫可能更好地闡明他們的本學科。

在歷史和記憶之間也有類似的分離。從十九世紀開始，歷史學家致力於糾正他們認為由記憶帶來的缺點。在學術界，神話、禮儀和民間故事被

認為只是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或關注前現代社會的學者們才合適的話題，而其中那些被記載於較近時代的卻幾乎被忽視。然而，正如柯文令人信服地所指出的那樣，故事的力量決不會在近代減弱。事實上，充分的證據表明，神話、禮儀和記憶的效力有所提高。有人曾經認為它們只不過是苟延殘喘，馬上就會在偉大的前進道路上消失，而事實上它們卻是現代性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從啟蒙運動以來，西方學界就努力將類似勾踐這樣的故事置於在人們的視線之外，讓人們對它們眼不見、心不煩。它們最常被藏在一個叫做「過去」的大而空的容器內。西方將「過去」視為一個和「現在」完全沒有關係的「外國」。另一個方便的密室是空間而不是時間上的。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從鄉村閉塞的地方、異國和處於較低層秩序的社會中尋找神話、禮儀和共同記憶，忽視了它們其實並不僅僅存在於遠方。

正如柯文所示，像勾踐這樣的故事組成了一種「潛在的意義，它流淌在按照慣例講述的歷史表面之下」。他這本書的目的是將中國政治和文化的這一源泉置於意識的表面之上，與歷史對話，並使歷史變得豐富多彩。勾踐故事以引人注目的方式給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生活和政治賦予了生命，這意味着西方啟蒙運動所導致的歷史與民俗、文學和記憶的徹底分離在中國從未有相同的影響。儘管和西方一樣，中國也遭遇了戰敗、災難以及其他的一切，但是與過去的撕裂感卻從未有過。在中國人的觀念裏，將歷史視為一系列長長的循環，從本質來說是基本上持續的，這有利於將歷史記載轉變成一個先例的寶藏庫，這在西方的學術思想中沒有真正的相似之物。即使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改造，也包含着與過去的對話。當西方思潮已經遠離了過去，讓它變得令人陌生之時，中國人堅持讓人熟悉他們的過去。

中國人從一個兩千五百年前的故事中尋求鼓舞的能力，在西方除了在宗教語境中之外，並沒有相似之物。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對遠古事件

的回憶都會在一定的禮拜儀式和預言性的語境中恢復活力。摩西在流放中領導他的人民的故事激勵了卓越的現代運動，例如錫安主義（Zionism）和非洲裔美國人的解放運動，但是這些運動在本質上都基於信仰，並沒有在世俗文化中產生較廣泛的響應。像勾踐故事這樣進入中國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方式，還沒有真的類似故事。西方也沒有真正可以激發起個人認同感的歷史人物，像普通的中國人對勾踐的感情一樣，儘管他是一個生活在極不相同的時間與空間的君王。

中國對於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或偶像崇拜行為並不是免疫的，但是對勾踐的認同感和太平天國運動或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截然不同的。其故事如此吸引人之處，在於一個男人用臥薪嚐膽來激勵自己，以堅持實現為自己報仇的最終理想的過程中的細節和意象。西方有其關於自我犧牲和不屈不撓的傳說，但它的英雄崇拜有着完全不同的規則。摩西、聖女貞德和喬治·華盛頓在很多地方與勾踐相似，不過他們依然是被神聖光環籠罩着的人物。

我們認同他們的方式和中國人認同勾踐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沒有一個美國學生會通過摩西在沙漠中所受的艱苦考驗、貞德的被焚或福吉谷（Valley Forge）過冬的悲慘來激勵自己備考。那些經歷都被視為屬於過去，它們被認為是值得尊敬而基本上無法實現的。唯一一個像勾踐那樣使人想模仿的西方人物是耶穌基督，但是那些明確地覺得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苦難（例如鞭笞）有聯繫的人極少受過教會的迫害，這使得對基督的崇拜默認是停留在缺乏個人認同的地步的，而那些將自己和基督相提並論的人也被視為異端。

對在中國傳統之外的人來說，越王勾踐的故事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是如此徹底的世俗化。君王的恥辱並不是由神決定的，他最終的勝利也只是人們努力的結果——包括他自己及他周邊人的努力。柯文沒有告訴我們中國的基督教是怎麼不斷地改變他的故事的，但看起來勾踐從來就沒有

被授予神聖性，這種神聖性正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用來包裝它們特定的英雄的。在西方，民間記憶被已建成的宗教系統化地改造，用於滿足它自己的目的。異教徒的英雄變成了聖人，而口頭流傳的傳統變成了神聖的文獻。幾乎從一開始，基督教就與流行的記憶發生了衝突，將後者視為缺乏信仰或是異端，從而一直需要糾正或審查。大體而言，學術性歷史的寫作和存檔的實踐是為教堂和政權的雙重利益服務的，因此會將它自己與其他通向過去的方法相隔離。

在中國缺少整體的宗教建設，這可能是流行的世俗記憶不但能倖存，而且對流行的意識有着巨大控制力的原因之一。看上去中國人對歷史的實踐對西方人認為的「純粹記憶」（mere memory）更為包容而更少排斥。事實上，柯文的闡述將會暗示，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在精心講述越王勾踐這樣的故事方面，中國的歷史學家們就成為了積極的合作者。中國人對歷史的實踐看起來沒有將它自己和流行的記憶相疏離。恰恰相反，它一直通過不同的方式支持和推廣它。如果說在西方民間記憶被忽視和邊緣化，那麼在中國它成為了公共和私人話語的中心。這個特別的傳說不是從被抑制的口述傳統中突然蹦出來的，而是長久存在於為人熟知的文獻之中。勾踐從來沒有被從「現在」放逐，古越國也沒有被認為是一個「外國」。相反，兩者在現在都受到了歡迎，並支持着一系列不同的政治和個人議題。

今天，在歐洲和美國，記憶都成為了時髦的話題。每個地方的歷史學家們都試圖將他們自己研究過去的方法和流行記憶中的觀念之間的分歧聯結起來。像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邁克爾·卡門（Michael Kammen）和大衛·羅文紹爾（David Lowenthal）這樣的學者已經向我們提出了挑戰，讓我們跨越存在於民俗、文學、神話和歷史之間的分歧，質疑那些將各個學科互相隔離的學科界限。對那些像我自己一樣置身於這一計劃的人來說，這個中國的範例提供了很多有趣的洞見。很明顯，在西方，關於歷史和記憶長期以來的語境和在中國的依然非常不同，但是柯文

富於啟發性的闡述向我們展示了可以如何重新思考我們的學術界限。將這本書作為一個範例，應該可以更加簡單地發掘我們自己政治與個人文化中隱藏着的源泉。

約翰·吉利斯 (John R. Gillis)

2007年10月24日

## 前言

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 有一次就其 1953 年的戲劇《薩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 說：「當這部戲在當地突然大受歡迎時，我差不多就能夠說出那個國家的政治環境是怎樣的——它或是對即將到來的暴政的警告，或是對剛剛過去的暴政的提醒。」<sup>1</sup> 當然，米勒這番話的原因，是儘管其戲劇講述的是十七世紀晚期在麻省薩樂姆 (Salem, Massachusetts) 的「逐巫」，但也幾乎不加掩飾地反映了對其自己所處時代「逐巫」——麥卡錫主義 (McCarthyism) ——的憤慨，因此無論這種壓迫可能在何時或以何種形式出現，它都可以作為政治壓迫的一個象徵。這種在故事和環境之間，在一種敘述和一個當代歷史條件（這種歷史條件可以推動生活在其中的人對這一敘述賦予特殊的意義）之間的共鳴，是這本書所主要關注的。

儘管這樣的故事從理論上來說能夠是古代的或是現代的，虛構的或是真實的，本土的或是外國的，但是最強有力的通常是那些從一種文化自身的歷史中所提煉出來的。當然，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在那裏從古至今人們都展示了對披着歷史外衣的故事抱着濃厚興趣。東周時期東南部的越國國王勾踐（公元前 496 年至公元前 465 年在位）的傳說為這樣的故事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在整個二十世紀的各種不同環境下，它都以獨特的力量與中國人對話。雖然最初我是在閱讀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國恥

---

1 Miller, *Timebends*, 頁 348。

有關的材料時遇到這個故事的，但我很快就發現這一敘述和其他很多問題也相關。在晚清以前，除了古代文獻本身以外，傳播勾踐故事的主要載體是戲曲、歷史傳奇和其他形式的文學創作（口頭的和書面的）。然而在二十世紀之交，這個故事開始用更多的其他手段來傳播，包括報紙和期刊的出版、學校的啟蒙讀物、平民教育材料、話劇，以及——在這個世紀的稍後時間內的——廣播、電影和電視。

從古代最初出現直到現在，這個故事的核心結構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可是和大多數中國古代的歷史故事一樣，它隨着時代而發展變化，有一些元素被重新改造，有的則被刪減，有的則被增加。<sup>2</sup> 例如，在不同的戲曲版本中有一個廣受歡迎的情節在最初的故事中並不存在，那就是勾踐的重臣范蠡和絕代美女西施之間所謂的羅曼史。換言之，這個故事的文本和相對穩定的契訶夫（Chekhov）戲劇或是簡·奧斯丁（Jane Austen）小說文本來說，是具有可調整性或是柔韌性的。事實上，在勾踐的事例中，即使談到「文本」都可能會有誤導性。在這個故事最初出現之時，在中國是通過口頭流傳的方式產生影響的。在之後的時間裏，正如那些由如此眾多的歷史人物——這些人物幾乎沒有可靠的信息（比如聖女貞德）——所激發而產生的故事一樣，這個故事幾乎不停地被循環使用，以滿足不同聽眾、不同歷史時刻和不同作者偏好的需要。<sup>3</sup> 很明顯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對中國人來說重新講述勾踐的生活和事業的重要性更多地在於它作為故事的多方面吸引力，而不是在於其包含的歷史真相。

在從鴉片戰爭（1839 — 1842）到共產黨在 1949 年取得內戰勝利的所謂恥辱的一個世紀裏，一大批中國人——從清朝的高官（林則徐、曾國藩）、二十世紀的主要政治領袖（蔣介石）到羈留在舊金山灣區天使島移民局（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或是最後到了菲律賓的低層移民，都發現勾踐故事有着不同尋常的吸引力，並且當他們面對看起來棘手的個人或政治問題時，通常會將其視為鼓舞和激勵的源泉。<sup>4</sup> 在共產黨執政和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即使在截然不同的環境裏，這個故事繼續保持着影響力。例如它周期性地出現在共產黨的戲劇創作之中，作為傳播各種政治信息的載體，而在 1949 年後的台灣，它為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目標提供了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支持。

上述最後的觀點所指出的，而且其優點所強調的，是像勾踐故事這樣的故事，在何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被共享的「中國」文化資源，它遠遠比政治的分隔更為深入。當我在翻看 1974 年國民黨政府為中小學學生所編的國語課本時，有一種特別的力量讓我深刻感受到了這一點。這些課本出版於台灣，當時大陸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正處於最緊張的狀態。每一本教材中，都有一課叫做《愚公移山》。這是一個古老的寓言，寓意是只要有足夠的決心，任何目標都能夠被實現，無論它有多麼困難。小學課本中的另一篇課文將這個寓言和台灣南部曾文溪水庫建設所遇到的工程挑戰相聯繫。<sup>5</sup>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文革時

2 關於在古代中國故事變得複雜，並且此後繼續發展變化的過程，見 Owe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頁 88。宇文所安只以伍子胥為例，他恰好在勾踐故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3 在貞德的情況中同樣沒有固定的文本，而瑪麗·戈登（Mary Gordon）告訴我們，除了不同的故事講述者之外，小說、電影、戲劇和電視也對她的故事有着眾多的演繹。見 *Joan of Arc*, 頁 148—165。

4 關於林則徐，見文舟：〈論林則徐流放詩的用典藝術〉，頁 89。關於曾國藩，見薛麒麟：〈曾國藩文化人格論〉，頁 55。關於蔣介石，見本書第二章。關於移民留在天使島上的提及勾踐故事的詩歌，見 Him Mark Lai et al., *Island*, 頁 56、124—125、139、143、158、160。關於在菲律賓的中國移民將自己和勾踐故事相等同，見〈看華視歷史劇《越王勾踐》〉。

5 寓言的素材來自道家文獻《列子》。〈愚公移山〉，載《國民小學國語》，4（第 23 課），頁 65—66，以及〈曾文溪水庫〉，同上，12（第 6 課），頁 17—19；〈愚公移山〉，載《國民中學國文課教科書》，3（第 15 課），頁 67—70。

期毛澤東（1893 — 1976）也大力推廣了同一個寓言——它是每個人都應該會背誦的「老三篇」之一——以鼓勵中國人民推翻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座「大山」。<sup>6</sup> 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意義，但是這個作為中國文化基石一部分的故事卻是一樣的。

一個中國的學者不久前對我說，中國學童對勾踐故事的熟悉程度，就像美國的兒童對《聖經》故事中亞當和夏娃，或是大衛（David）和歌莉婭（Goliath）的故事一樣——這個故事「在我們的骨子裏」。然而，儘管它在中國文化世界中有着無處不在的影響，但是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美國（非華裔）學生中，它卻幾乎無人所知。而專治中國古代歷史或文學的（美國）學者雖然熟知勾踐故事，卻不見得了解在二十世紀它對中國人的重要性。很明確的是，勾踐故事是文化知識中的一種人造品，在每個社會中都可以找到它們。對於「圈內人」——那些在這個社會長大並上學的人——來說，他們在年幼時就被輕易地灌輸了這些故事，這是他們文化訓練的一部分；而對於「局外人」——那些主要從書本學習文化或者作為成人只在該社會住過短暫時間的人——來說，幾乎從來不會遇到這些故事（或者遇到了也不會注意）。這種奇妙情形——這種情形表明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學習文化的軌道——的後果之一，就是勾踐故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在美國歷史學家（而且據我所知，是普遍的西方歷史學家）的作品中完全地被忽視了。

更奇怪的是，中國的歷史學家看起來也忽視了它。請允許我在此直言。二十世紀的中國學生和很多他們的美國同學不同，熟知勾踐的故事，

6 關於這個故事和當代的聯繫有更早的討論，見毛澤東於1945年6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總結發言。見其〈愚公移山〉，第3卷，頁321—324。關於較後的論述，見〈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北京評論》，1966年6月24日，頁15—17；Liang and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頁78、175。

也清楚了解對它的講述（或是提及）是無處不在的，特別是在特定的歷史節點上。<sup>7</sup> 但是我幾乎沒有看到過他們將這個故事和它本身的處境之間的關係視為嚴肅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適當話題。之所以如此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從一定角度和在特定時刻如此細緻的考察可能在政治上過於敏感，勾踐故事的情況尤其明顯。但是我懷疑一個更為基本的原因是大多數中國人簡單地接受了故事一處境之間的關係，把它視為理所當然的。換言之，這不是會引起他們高度自我意識的東西。即使從遠古而來的故事都可以對現在所發生的進行有意義的對話，這種觀念對他們來說是從兒時起就根深蒂固的。因此，他們關注這樣的故事為的是尋求它們在當今所能提供的引導或精神價值，但是他們幾乎不可能會跳出這個故事，來考察故事一處境之間關係「本身」的獨特重要性。這在中國或其他文化環境中都一樣。

還有另一個原因令歷史學家們沒有在他們的敘述中提到勾踐故事。儘管它在其他方面的各種重要性，當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被設計成一種對內在聯繫事件的敘述時，這個故事對這樣的歷史就沒什麼貢獻可言了。事實上，將它完全從這種敘述中刪除——正如已發生的事實一樣——並不會顯著地改變整個歷史畫卷（當然從思想文化史的很多其他角度來說也是如此）。然而，當我們將注意力轉向勾踐故事如何影響中國人對他們經歷的觀念——這是一種對中國歷史更為內在的視角——時，我們對事情會有完全不同的感覺。正如心理學家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所說，我們「堅持現實主義的敘述模式，並用它們來塑造我們的日常經歷。那些我們在真實生活中所認識的人，我們會說他們是米考伯（Micawbers）或是托馬斯·伍爾夫（Thomas Wolfe）小說中的人物」。這些故事變成了

7 一個歷史劇的評論家在1960年代初說：「在今天，當黨號召我們艱苦奮鬥發奮圖強時，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對廣大觀眾來說就有了吸引力。」見王季思：〈多謝這樣的歷史故事戲〉，頁121—122。

「經驗的模板」。他接着說，這些模板的驚人之處在於「它們是如此特別，如此地方化，如此獨特，但又如此觸手可及。它們是顯而易見的象徵」，或者如他在另一處所說的，「人類環境的根本象徵」。<sup>8</sup> 當從布魯納的意義上，把勾踐故事理解為一個根本的象徵——或是幾個這樣的象徵，它所呈現出的歷史形態，比我們從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標準敘述中所能猜到的更能令人印象深刻。在接下來，我要探索的正是這種形態。

本書的基本計劃，是在開篇介紹古時的勾踐故事後，考察這個故事從晚清到現今如何通過滲入中國歷史發揮功能，起到作用。我想要完全明確的是，我的首要興趣不是這個故事「作為一個故事」是如何演化的，這項工作最好留給中國文學的學生去做。相反，我所感興趣的是中國人所採用各種不同方法——有時是本能的，有時是自覺的——使勾踐故事的內容滿足於不同歷史環境的需求，以及為什麼故事和歷史的這種融合被認為是舉足輕重的。

## 致謝

這本書開始的時候並不是這個樣子的，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最初我想深入研究的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中國人對於國恥的敏感性。然而，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我不斷地遇到越王勾踐的故事，它不但講到了國恥，而且也談到了很多其他的內容。很明顯如果我拘泥於原計劃的話，就會不得不忽略勾踐故事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這是我所愈來愈不願意做的。這本書是獻給親愛的洗玉儀 (Elizabeth Sinn) 的，她幫助我走出了這個困境，建議我考慮寫勾踐故事的全方面影響，而不是國恥這個話題。這是一個簡單而激進的建議，因為它不僅意味着該書特別關注點的轉移，還意味着更為廣泛的話題的變化，這些最終會組成它的思想核心——最重要的是故事和歷史之間的關係。儘管當時對這個等待着我的學術探險只有一知半解，但是我熱切地接受了玉儀的建議。此後的一些年裏，她耐心地回答我無數關於該書具體材料的煩人問題，對此我深深地感謝。但是我對她最為感激的，是開啟了我的心扉，讓我知道在路上轉向的可能性。否則的話，我可能不會做這樣的選擇。

我同樣從不少人的幫助中獲益良多。卜正民 (Timothy Brook)、蕭邦齊 (Keith Schoppa) 和另一位匿名的評論者閱讀了整份書稿，而且在給予極大的鼓勵之外，還指出了該書可能的改進之處。柯博文 (Parks Coble)、林培瑞 (Perry Link)、瓦格納 (Rudolf Wagner)、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谷梅 (Merle Goldman) 對整本書的各個部分提供了有用的建議。通過在印第安納大學、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

8 Bruner, *Making Stories*, 頁 7、34—35、60。